

# 马克思

# 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

人民出版社



• 5  
研究所

马 克 思

# 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

(未发表过的手稿)

阿·奥采特阿院士和斯·施万发表

人 民 大 兵 社

K. MARX  
ÎNSEMNĂRI DESPRE ROMÂNI  
(MANUSCRISE INEDITE)  
Publicate de acad. A. Oțetea  
și S. Schwann  
Editura Academiei Republicii  
Populare Române. București, 1964.  
据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科学院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马 克 思  
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

(未发表过的手稿)

陆象淦译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1973年6月第1版  
197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876 每册 0.40 元

内 部 发 行

## 前　　言

这本书里所介绍的文章抄自四件马克思署名的手稿，手稿存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

这些手稿的卷宗编号如下：

1°—B85: 卡·马克思: 笔记本 XCI 摘录: 伊腊斯·雷诺, 《多瑙河各公国政治和社会史》, 原版 1860 年, 法文、英文、德文, 41/4\* + 12p. \*\*。 (B85: K. Marx: Excerpte Heft XCI: Elias Regnault,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Orig. 1860, franz. engl. deutsch. 41/4\* + 12p. \*\*)

卡片背面:

\*/笔记本 XCI/马克思称之为笔记本 D 第 20—24 页。

马克思没有写书名。引证和报道与上述书符合。

\*\*/笔记本 LXXXV/, 第 13—24 页。

2°—B86a 或 A.40, 也是伊·雷诺 (E. Regnault) 上述书里的一段摘录。这段摘录在: 笔记本 LXXXVI A, 第 175, 178 页。卡片上注明: 1860, 法文, 11/4 页。

3°—B91 包括在: 笔记本 XCI, 指明查: 伊·雷诺:

《条约的信誉。缔约诸强与拿破仑第三帝国》，巴黎新生出版社 1859 年版(E. Regnault: La foi des Traités. Les Puissances signataires et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Nouvelle éd. Paris, 1859.)。

不过，我们抄用的编号 B91(20) 的这个片断，不在这本书里，而是在《多瑙河各公国政治和社会史》里。

卡片加注：原文法文、德文。2 页。

4°—B63 卡尔·马克思：笔记本 LXIII 摘录，第 1—4 页；《俄国人在莫尔达瓦和瓦拉几亚》，1849 年版，1853 年，英文、德文，31/2 页。(The Russians in Moldavia and Wallachia, 1849, Orig. 1853, engl. deutsch, 31/2p.)

头三件手稿是伊腊斯·雷诺的书<sup>①</sup>的读书札记和摘录。内容最丰富和最重要的是 B85 号手稿。但是涉及该书头九十四页的开端部分没能找到。同样，对包括结论部分的该书后二十八页也没做笔记，大概是因为这部分和马克思的意图无关。因此，马克思手稿中保存下来的是涉及该书第 94—520 页的部分。

B86a 和 B91 手稿包括的也是雷诺的书的摘录，但更简短。B86a 手稿涉及该书第 305—311 页，B91 手稿涉及第 207—265 页。但是 B91 手稿也缺开头部分，而最后一页摘录了雷诺著作的前言。

---

① 《多瑙河各公国政治和社会史》，巴黎，1855 年，XI + 548 页。

题名为《俄国人在莫尔达瓦和罗马尼亚公国》的 B63 手稿，是 1853 年 9 月从一个英国作者的书里摘录下来的，这从最后一部分可以看出，那里写道：“The calicoes, of which our export consists”（构成我们出口的单色布）。我们没能找到作者的名字。不过，根据研究所的图书索引提供的线索，以及这编手稿从《马基雅弗利讲演集》（第二版，1849 年伦敦版）里摘录下来的引言看来，这本书可能是在 1849 年出版的。

因为不了解 B85 手稿的开头部分，所以没法判定确切的日期。阿姆斯特丹研究所的图书索引标明是 1860 年。但也不能排除是在更早的时候编出来的，不过，无论如何，是在 1855 年以后。

在行文方面，马克思多少不等地使用了法文、英文和德文。法文占的份量最大，因为主要的材料来源是伊腊斯·雷诺的法文著作。德文特别被用来归纳所使用的材料来源中的某些大段、表达个人意见，或在用德文以外的其他文字书写的句子中插入一些个别的词、定冠词、连结词、前置词和副词。除非材料来源是英文的（见 B63 手稿），马克思较少用英文。

B85 手稿是用法文、英文和德文写的。有时，同一句话里包括了所有三种文字的词。叙说句子都很短，往往是省略句。——B86a 手稿几乎全都是用法文写的。——在 B91(20) 手稿里，马克思用的主要还是法文，偶尔也用一

些德文。至于 B63 手稿，则是全部用英文写的。

在辨认这些材料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两类困难：一类来自书法方面（由于交替使用哥德体粗黑字母和拉丁字母，或在同一个词里同时使用这两种字母），另一类是由于马克思经常使用缩写字引起的，特别是在用德文写的手稿里。这些缩写字有两种：（1）缩减，如：用 dchschte 来代替 durchschaute，用 st 代替 seit，用 dr 代 dieser，用 dhr 代 daher，用 ftwhd 代 fortwährend，用 bdtd 代 bedeutend，用 vhssg 代 verhältnismässig，等等；（2）省略构成字尾的一个或几个字母，如：用 J. 代 Jahren，用 d. 代 devient，用 ott. 代 ottomanische，等等。容易辨认的人名和国名可以归到这第二类，如：用 Mold.-Val. 代 Moldo-Valachie，用 Oestr. 代 Oesterreich 等。

不过当马克思把 votiren, intriguren, lancirt, denoncirt 等写作 votieren, intrigieren, lanciert, denonciert 等时，却不是缩写，而是根据当时的正字法。当时的字典可以证明（参看：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ais-allemand et allemand-français *par* M. A. Thibaut, XLIII-e éd. Brunsvic (Braunschweig), 1863 [提鲍特编《法德和德法新辞典》，第 43 版，不伦瑞克 1863 年版]；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ais-allemand et allemand-français *par* A. Molé XXV-e éd. Brunsvic(Braunschweig), 1869 [莫莱编《法德和德法新辞典》，第 25 版，不伦瑞克 1869

年版])。

为了使抄本尽量忠实于原文，我们保留了这些特点。只是在非常情况下，我们才离开这条原则。例如，在句点以后，一个句子开头的地方，马克思用了一个小写字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恢复了大写。

有时，我们在注释里，根据雷诺原著，恢复了原来的字形。下列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马克思的手稿

第 61 页

L'impôt et la faim  
nécessitent l'emprunt;  
d. Prêteur wieder d.  
paysan.

雷诺的原文

第 311 页

L'impôt et la faim  
nécessitent l'emprunt:/  
…/, le prêteur du  
paysan est le pro-  
priétaire.

第 67 页

Magyars, im X. Jhh.  
settled in d. montagnes,  
qui avoisinent la Molda-  
vie, aux sources de l'Olto;  
nehmen so ein un coin de  
l'ancienne Dacie—Szek-

第 352 页

Les Roumains de  
Transylvanie s'étaient  
maintenus libres jusqu'—  
au X-e siècle. Cepen-  
dant quelques débris  
des soldats d'Attila

lers (Débris des soldats d'Attila). s'étaient fixés dans les montagnes quiavoisinent la Moldavie aux sources de l'Olto.

马克思著作的所有出版者，从恩格斯开始，都特别提出在辨认和抄写马克思手稿时碰到的重大困难。在我国尝试出版马克思的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手稿还是第一次。我们辨认出来的有些词，也可能作别的解释。例如，由于马克思的缩写，有时很难确定应该念成 suzeraineté (宗主权) 还是 souveraineté (主权)，Roumains (法文：罗马尼亚人) 还是 Roumans (英文：罗马尼亚人)。马克思涂改的地方我们也照样复制了，他涂掉的字放在尖括弧里。辨认时没有肯定的词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圆括弧是马克思的原作。没能辨认出来的段落，我们用了删节号并加方括弧〔……〕。

与马克思的原文一起刊载了罗马尼亚文译文<sup>①</sup>，以便于理解。在翻译时我们还参照雷诺的原著以补全省略句的意思，或者是为了更易于理解从一个思想突然转到另一个思想。

札记中有些段落，马克思在重看时，大概认为重要，也可能在别的地方使用了这些段落，他在各行下面或在

---

① 中译据罗马尼亚译文并参照原文译出。——译者注

旁边用铅笔加了着重线。这些符号我们也复制出来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符号表明着马克思思想把这些段落用于他计划要写的著作或文章里的意图。

这些手稿都记载在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的清单里，史捷兴(Szczecin)教授(波兰)，斯坦尼斯拉斯·施万(Stanislas Schwann)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后者也作过首次抄写的尝试。

但是，我们能够成功地辨认这些非常难以辨认的手稿，并取得了这些手稿的发表权，这还应该特别感激研究所所长吕特(A. J. C. Rüter)博士教授先生的善意帮助。吕特教授先生不但给我们提供了精致的复制照片，并且在用原手稿核对复制稿时，还使我们能利用他的同事尼霍夫(D. D. P. Nyhoff)和舒斯特(D. Schuster)博士的经验和善意协助。在我们确定马克思手稿、编写序言和注释时，得到了查奈(G. Zane)和科尔内利亚·波迪阿(Cornelia Bodea)的很大帮助。这儿，我们高兴能公开向他们致以热烈的谢意。

阿·奥采特阿

## 序　　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特别关心罗马尼亚人民，因为罗马尼亚人民争取统一和独立的斗争是欧洲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是欧洲革命这个普遍问题的一个特殊事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文章中，罗马尼亚问题占了许多篇幅。同时，罗马尼亚人民以及波兰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形式，使马克思证明了封建主和农民村社之间的宗法关系，通过纯经济途径转入了农奴制。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一直都进行着紧张的出版活动，这种活动使他们传播了思想，有时这也是马克思的几乎唯一的生存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撰写各种学术研究和文章搜集了广泛的参考材料，这也证明了他们是如何精心地探讨自己所要研究的全部问题。

就是这样，马克思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也从当代各种出版物——书籍和报纸中采集了各种资料。

马克思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伊腊斯·雷诺的著作《多

瑙河各公国政治和社会史》<sup>①</sup>（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巴黎出版）。此书的宗旨和倾向是和当代事件、罗马尼亚流亡者的宣传紧密联系着的。

马克思多次提到雷诺的著作，这证明这部著作所包含的内容使他特别感兴趣。实际上，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是一些罗马尼亚人的著作的加工，这些著作出版于上世纪中叶，主要的作者是尼·伯尔切斯库(N. Bălcescu)、扬·吉卡(Ion Ghica)和埃里亚德·勒杜列斯库(Eliade Rădulescu)<sup>②</sup>。

这些作家的作品给雷诺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文件资料，并且通过他们论述这些文件资料和评价各种事件的方式，部分地影响了法国历史学家著作的倾向。伯尔切

---

① 伊腊斯·雷诺(1801—1868)，生于英国，父亲原籍法国，母亲原籍英国。是研究拿破仑一世、1848年临时政府、英国和爱尔兰的历史学家，是奥康奈尔的传记家、卡莱尔作品的翻译家，《民族的前途报》(L'Avenir national)编辑。他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代表。从1848年起开始研究罗马尼亚人民情况，搜集了资料，并在1855年出版了《多瑙河各公国政治和社会史》。从此书中可得出结论：东方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土耳其欧洲部分信仰基督教民族的独立，和罗马尼亚各公国实行联合。

② 尼·伯尔切斯库：《多瑙河各公国的经济问题》，1850年；扬·埃里亚德·勒杜列斯库：《凯撒的保护国，或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关于欧洲情况的新文件》，巴黎，1850年；扬·埃里亚德·勒杜列斯库：《罗马尼亷新生史回忆录或瓦拉几亚1848年事件回忆录》，巴黎，1851年；扬·吉卡：《俄罗斯对多瑙河公国的最近一次占领》，以塞诺阿(G. Chainoi)的笔名出版，巴黎，1853年。

斯库<sup>①</sup>给他提供了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关于贵族和农民的关系的全部材料，尤其是关于组织法所定的土地制度和1848年蒙特尼亞地区革命的土地纲领的全部资料。埃里亚德<sup>②</sup>给他提供了关于1848年革命前期文化和政治历史的资料，给他提供了了解革命进展情况必要的材料。扬·吉卡<sup>③</sup>给他提供了与当时罗马尼亚时局有关的多样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材料。在特兰西瓦尼亞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历史和这个地区的罗马尼亚革命(1848—1849)方面，雷诺特别使用了阿·巴比乌·伊拉里安的著作：《上达契亚的罗马尼亚人历史》，第I—II卷，维也纳1851—1852年版。

除这些基本著作以外，雷诺还使用了一些法国出版家关于罗马尼亚人历史和当代罗马尼亚政治问题的作

---

① 尼古拉耶·伯尔切斯库(1819—1852)，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政治行动，为取消农奴制、为给农民分土地、为民主改革、为建立反对独裁制度的共同阵线、为罗马尼亚人民的统一和独立作了斗争。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有：《多瑙河各公国的经济问题》，巴黎，1850年；《罗马尼亚人历史的革命进程》，巴黎，1850年；《勇士米哈伊大公时代的罗马尼亚人历史》，作者死后在布加勒斯特出版，1878年。他和拉乌里安一起创办了刊物《达契亚人历史集锦》。

② 扬·埃里亚德·勒杜列斯库(1802—1872)，作家、政论家、戏剧和高等教育的倡导者。1848年时是临时政府与督政府成员，取温和立场。

③ 扬·吉卡(1817—1897)，经济学家、罗马尼亚自由贸易的积极主张者，天才的作家，留下了出色的回忆录。曾是1848年革命领袖之一，是驻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尼亚公国代表。曾任驻伦敦全权公使十年，多次出任罗马尼亚科学院理事会理事长，罗马尼亚科学院成员和主席。

品，这些出版家有：费利克斯·柯尔逊(Félix Colson)，德伯雷兹(H. Desprez)，乌比西尼(J. H. A. Ubicini)，尤其是瓦扬(J. A. Vaillant)。这些法国出版家或曾与罗马尼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有过密切联系，或曾在公国住过一个时期。例如：柯尔逊曾任罗马尼亚公国自由派贵族领袖肯皮内亚努(I. Cîmpineanu)的秘书，并曾参加1838—1839年事件。瓦扬曾长年居住在布加勒斯特，并曾参加1840年的革命运动。乌比西尼曾是1848年罗马尼亚公国革命的目击者，曾任临时政府非正式秘书职，曾陪同罗马尼亚议员团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革命政权。1848年以后，曾和流亡国外的罗马尼亚革命者，如戈列斯库(A. G. Golescu)，保持密切联系，在1849年以后，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伯尔切斯库保持密切联系。德伯雷兹则在革命前就和伯尔切斯库结成了朋友，是罗马尼亚民族统一思想的热烈鼓动者之一。

除了这些作品以外，雷诺还使用了其他一些材料来源，例如关于罗马尼亚各公国的一些游记，以及当时有关罗马尼亚问题的外国报刊。

马克思利用了伊腊斯·雷诺的著作，实际上是对上述罗马尼亚人的作品，或法国人在罗马尼亚材料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作品进行了加工。例如，在马克思的摘记中，除历史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出自这些材料来源的总思想和结论。但是，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的

立场出发，科学地选择和阐述了这些材料。雷诺站在法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批驳了由维也纳条约确定形成的欧洲均势。例如，他支持反对俄国的战争，不是为了摧毁沙皇制度，而是为了削弱沙皇制度，因而也就是为了遏制正在威胁法国资产阶级在近东利益的沙皇扩张力量。可是雷诺懂得，企求建立一个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新的欧洲均势是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支持民族自决权，从而也就支持土耳其欧洲部分信奉基督教的人民，尤其是罗马尼亚人民的独立权。雷诺接受这样的假设：即使土耳其帝国取胜，也不再能成为东方和西方的缓冲国，所以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作为未来的欧洲均势的因素之一，并且根据法国资产阶级的打算，也不隐瞒应该由罗马尼亚国家承担的经济和政治作用。

实质上，这位法国作者反对作为各被压迫民族解放手段的革命。他说：“靠政府的帮助来实现各国人民的复兴，比用革命的武器来实现各国人民的复兴要好。”马克思研究了各个问题，实际上也就以总的欧洲革命运动的观点，分析了摘自雷诺的具体历史材料。

马克思研究雷诺著作中的材料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有时马克思整段整段地摘引，有时又把整页整页的话紧缩成短短的一句话；冗长的插话、轶事都被完全删去。马克思采用的材料都是能够用来说明他的主题思想的资料或言论：关于大国的扩张和侵略政

策，尤其是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所起的反革命作用，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各公国在和土耳其、沙皇俄国的关系中的权利，罗马尼亚封建制度下对农民的剥削方式，1821年、1848年在公国发生的革命运动，以及1848—1849年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文化运动的进步作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居民受匈牙利领主的压迫。

马克思插入的批语有力地反映了他对待各个事件和各种人的立场。罗马尼亚公国的贵族企图重新掌握政府，采取镇压行动，这被马克思称作“**飞扬跋扈、卑怯残暴的反动**”。埃里亚德(Eliade)和马格鲁(Magheru)由于曾劝说比贝斯库大公(Bibescu Vodă)出来领导革命，而被马克思严厉斥责。曾甘当俄国驻罗马尼亚公国特使杜哈美尔(Duhamel)的执行机构这个令人鄙夷的角色的土耳其特使傅阿德帕沙(Fuad Pasa)，被痛骂为“**傅阿德蠢驴**”。罗马尼亚公国的革命者对法国临时政府所抱的希望被马克思讽刺为“**对共和法兰西的痴呆信任**”。土耳其军队在9月13—25日(在斯比里依山坡)的行径和杜哈美尔将军的态度被简略地、但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况地称为“土耳其人的兽性残暴、土耳其人的卑鄙无耻(**杜哈美尔站在大屠杀后面**)”。

如果雷诺的结论是击中要害和正确的，马克思即予以采纳，并加以突出。例如，关于谋杀图·弗拉迪米雷斯

库 (T. Vladimirescu) —— 1821 年革命运动的领袖，被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 (Alexandru Ispilanti) 下令杀害——马克思就采纳了雷诺的判断：“卑鄙的谋杀”。有时，在结论中插入的一个词就可以显示出马克思的立场。例如，在雷诺概括罗马尼亚人民在 1848 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一句话中，马克思插进了农民这个词，以肯定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在伊兹拉兹原野，农民群众开创了革命；在布加勒斯特，它拯救了革命；在图拉真军营，只有它没有失去希望。”

从雷诺书里选择的历史资料、概括文章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无庸置疑地表明着马克思的观点。但是，完全证明这点看法的事实是，他在自己的政论文章里，在最重要的作品《资本论》里，吸收和使用了这些材料。正为大家所知，马克思是从“工人运动、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前途，根据革命利益”<sup>①</sup> 来分析当代问题或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剥削形式的。

即使简单地介绍一部分在我们刊印的文章里和在已经出版的马克思著作里都有的历史材料，也许就可以更确切地判定这些手稿的意义和重要性。

雷诺的书里，对我国形成大庄园的条件和罗马尼亚各公国土地关系的演变，有一段解说。雷诺特别论述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X 页。